

● 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 ●

Televis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India

电视与 乡村社会变迁

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美]

柯克·约翰逊

Kirk Johnson

著

展明辉 张金玺/译

展 江/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电视与 乡村社会变迁

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美]

柯克·约翰逊

Kirk Johnson

展明辉 张金玺/译

展 江/校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 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 (美) 约翰逊著;
展明辉, 张金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
ISBN 7-300-06680-1

I. 电…

II. ①约…②展…③张…

III. 电视-传播媒介-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6209 号

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

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美] 柯克·约翰逊 著

展明辉 张金玺 译

展 江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2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的认可。大众传播在当今各国的政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媒体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正在以神奇的力量全面介入和监视政治过程，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工具。

对于发展中社会来说，许多国家发生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一种能够保障社会真正稳定的政治制度之下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正在探究和实践之中。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在美国新闻工作者兼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和我们今天更熟悉的“信息社会”的建构中捷足先登了。进入 21 世纪，世人又看到，随着

“9·11”事件的发生和信息的实时传播，全球化也可能伴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

然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在全球性的变革中，人类形成共识或发生冲突的过程都是一个信息能否有效传播和信息意义能否共享的过程。如果我们说“传播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指的是将信息以言语的形式或通过媒介从一个个体或群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话，那么信息和信息传播在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本来就一直是新闻学、传播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如今，加入这一研究的学者已经涵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了。

因此，我们推出这个译丛，意在介绍国外知名学者从多学科、多学派的角度探究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力作，为我们的本土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和操作镜鉴。

政治社会化：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启示

黑幕揭发运动是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刚刚完成之际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其中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兼新闻工作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伴随着深度解析的报道和言论抨击了社会转型以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与政界、商界和知识界的其他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民众觉醒——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马克·吐温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经济迅速形成，富有的东部工业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治。据调查：1890年，八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八分之七的财富；1900年，10%的人拥有全国90%的财富，百万富翁从1860年的3个增加到约3800个；一些小型分散的企业通过合伙经营、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组织方式，发展成支配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

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美国生机勃勃。但是，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成堆的

问题：政党核心小集团（machine）和老板（boss，一译党魁）控制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血汗工厂、贫民窟的存在，劳工互相倾轧，许多人没有选举权，税法不合理，对黑人移民存在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农民不满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等。

黑幕揭发运动从1903年初发端，迅速席卷社会各个角落。在政治领域中，它从城市、州波及国家立法机关。其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被一一揭露出来。黑幕揭发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十多年。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 000多篇文章。

受黑幕揭发运动的影响，美国通过了许多影响至今的改革性法案，其中包括：《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宪法第十七修正案》（1913）、《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肉食检查法》（1906）、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报纸公示法》（1912）、《联邦储备法》（1914）、《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家这样评价黑幕揭发运动的意义：“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男男女女与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牧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

传播与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与护佑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对现代化的追求已经超过一个世纪。然而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内

在的变革力量才与发达国家有了日益广泛和深入的交往。在这种交往持续了20多年后,我们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是因为,社会转型绝不是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需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伦理和大众传播在内)诸体制方面实现转换,而单靠引进科学技术和方式就能解决问题。

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面,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时期遇到的普遍问题,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政治和经济腐败蔓延和当代世界普遍的社会偏离(卖淫、赌博、吸毒、犯罪等),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改革开放后原有价值观的式微与道德真空、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作为后发国家又受到了信息社会的挑战,等等。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面临着全面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多重任务。

在当下已确立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战略和建立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前提下,借鉴各国的体制、理论和运作机制,构想和设计大众传播新体制,为建立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和公民社会担当社会守望者和社会雷达的角色,就凸显出其重要性来了。

我们重视传播与现代化视野下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这两个基本取向。一方面,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于民主与法制的促进作用日益突出,同时正在显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提振经济的功能,而且传播业本身已成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份额的新兴产业,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传播负向功能的表露,改革媒介生态以及开展媒介批评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凡此种种,呼唤着学术界的积极回应。

除此之外,本译丛还格外重视由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开创的技术研究取向。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

IT 业的迅猛发展，印刷（文字）文明和电子（影像）文明的交替正在进行和加速之中，而这种交替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是否正在和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是否扩大了信息鸿沟和代际鸿沟？是否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方式？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恐怕需要在传播学研究中进一步提升。

展 江

2005 年 6 月 25 日

译 序

这是一本社会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民族志专著，虽然作者为美国人，研究对象为印度的一两个村庄，但是鉴于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众多、同样在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目标奋斗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巨大的差异性——中国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①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本书所呈现的绝不仅仅是一幅异域风情图。笔者相信，本书中文版的推出主要致力于一个具体的学

^① “差序格局”是讲传统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我”处于伦理和认知的中心，其他一切关系——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都由“我”而派生，仿佛一个同心圆，圆心与圆心外一圈圈散开的涟漪，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不断扩展的秩序”。这一“差序格局”也是传统中国人看待和沟通世界的特有方式，是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理想的具体表达，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

术目标：为社会学的传播学进路和传播学的社会学视野提供一个范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具有特别的方法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尤其是传播学一直是社会学的近亲。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大社会学家研究过新闻事业和传播问题，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先驱，甚至直接被称为传播学奠基人。这其中包括：法国19世纪末三大社会学家之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43—1904）（1967年，美国学者编辑出版了他的《传播与社会影响》^①一书），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2000年，美国学者编辑出版了《滕尼斯论公众舆论：文选与分析》一书），记者出身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主将罗伯特·帕克（1864—1944）（著有《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等人。至于当代，知名社会学家介入新闻与传播研究者更是不乏其人，如美国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罗伯特·默顿、伊莱休·卡茨、梅尔文·德夫勒、迈克尔·舒德森，德国的于尔根·哈贝马斯，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

而与社会学相比，新闻学与传播学要稚嫩得多。这恐怕是因为：首先，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校园里的学问”；其次，社会学的历史虽然不到两百年，但是它能够令人羡慕地吸引各国的顶级学者和思想家从事其研究；再次，由于一代一代师生的薪火相传，因此社会学家敢于自豪地宣称“社会学是一门完善的学科”^②。

与多数本科学者在学院和大学里任教的社会学不同，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即它是由一个近代出现的社会职业催生出来的，因此经常被非学术方面的力量要求去“理论回到实际”。而由于受到现实政治和商业化

① 该书中文译本被列入“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7月出版。

②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职业的功利性影响，新闻学的学术性——首先是抽象性和规范性——难以提升，自然也难以与实践性同一，因此“理论”与“实践”往往成了两张皮。这就造成了现实中的尴尬：在学界，学科地位飘忽不定^①；在业界，理论研究备受冷落。

这并不是说，社会学不重视实践。但是它的实践与法学和医学类似，是学院派取向而不是社会职业取向的，是学者主导而不是业者主导的。这也并不是说，社会学是自我成长起来的。实际上，社会学受到多个学科的影响，它有“实证哲学”的乳名，一开始就从生物学等学科搬用了“有机体”等许多概念，后来还与人类学并驾齐驱，在研究方法上互相借鉴和激励。

有鉴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恐怕应该注重学科的自主性和科学性，并勇于承认学术水准的差距和学术心态的保守，博采众学科之长以加速发展，其中社会学的养分是应该优先汲取的。我们先来听听社会学家就新闻人和社会学家所作的比较和对新闻界的批评。记者出身的罗伯特·帕克认为，社会学家是“一种超级记者，就像《财富》杂志的撰稿人一样……报告的是记录实际在发生的事情的长期趋势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看似要发生的事情”^②。

当代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更加直言不讳：“新闻记者们在谈及社会学研究时，职业社会学家认为极具重要性的问题似乎又很少能在记者们所采写的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更进一步说，新闻报道总是歪曲了职业社会学家的研究”；“总的来说，新闻记者不曾受过社会科学的教育，他们甚至也没有意愿去辨别他们所采写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优劣，或者将自己所采写的研究与类似的其他研究进行比较”^③。如果说美国的新闻教育和记者

① 这一学界通常由业界人士和学院派组成，其内部也有没完没了的理论取向与实践取向之争，后来落户于新闻院系的传播学也立足难稳。

② http://www.lib.uchicago.edu/projects/centcat/centcats/fac/facch17_01.html

③ [美]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33～34页。

的职业教育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中国新闻学界也足以引以为鉴。

社会学与人类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是姐妹学科。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都形成于19世纪的西欧国家。作为从整体上和从发展机制上对社会进行综合具体考察的学科，社会学就应社会的这种需要而出现了。人类学则出于社会对不同族群增进理解的需要而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人类学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形成，与西欧国家到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开拓殖民地有很大关系。两个学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理论方法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①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为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社会，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为所谓的“初民社会”。

所谓“民族志”（ethnography），就狭义而言是通过田野采集工作，对于一个特殊文化的记录与分析研究；就广义而言则是利用各种文献资料与文化实践的融合，来梳理出民族文化的整体内涵。而民族志的基本意义在于：从民族志的建构，塑造出文化的模型，再通过历史的、比较的民族学方法，诠释其民族特质与文化内涵。^② 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等等。^③

人类学的传世之作是缤纷绚丽的社会画面，是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这就是人类学表达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的民族志不仅描绘场景而且

① 张沁洁：《对功能理论基本概况的阐释》，<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shijiao/200210/200210210024.htm>。

② 参见钟宗宪：《“图腾”理论的运用与诠释》，<http://www.shezu.net/666/dispbbs.asp?boardID=8&ID=912>。

③ 参见刘珥珥：《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http://sci-cul.ihns.ac.cn/showarticle.asp?id=125>。

探索其深层的意义。人类学就其起源来说,是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开始的。西方人类学家远离本土,到亚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研究不发达部落人民的生活。在人类学发展的百余年间,一代一代的人类学家以生动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互不雷同的人类生活图景:库拉圈交易(马林诺夫斯基)、菊花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萨摩亚人的成年(玛格丽特·米德)、巴厘岛上的斗鸡(克利福德·格尔茨)等等,这些都是著名人类学家写下的不朽名篇中的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学家在描述这些生活图景的时候,就说明了有关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婚姻亲属关系、信仰、宗教、礼仪习俗、居住交往,以至人们的社会地位、角色扮演、整个社会的结构等等。^①

总之,人类研究的要义在于揭示不同文化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在于揭示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同于社会学家,他们以深入的现场观察和生动的描述记载生活,又以透彻的理解剖析所见所闻。

“人类学转向”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大类别就是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又译“质的研究”)^②,是与人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要使用 field work 研究方法。在人类学中,通常译为“田野调查”或者“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方法的组成部分,是这个学科的发展基础,也是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成为一种通向专业文化人类学的通道”^③。而 field work 在社会学中常译为“实地调查”,过去和现在都有运

① 参见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4)。

② 学者陈向明博士不同意按习惯将 qualitative research 译为“定性研究”,参见其著《质的研究方法》,21~2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③ “Ethnograph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4, pp. 583-584,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93.

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

人类学家通常通过田野工作深入到研究对象当中，参与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以及对于文化的看法。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甚至把田野工作视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石”。如果说，田野工作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成丁礼”的话，那么，在田野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志作品则是人类学家成熟的标志。^①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学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田野作业和研究已从早期的封闭的民族志撰述向在“全球化”思维框架下研究当地社会生活的方向转变，认为任何族群都不可能生存在与世隔绝的小社区内，而是与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社会，虽然早已存在，但是现在变成主要的活动。人类学发展初期主要是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这种情况是和人类学诞生时期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的。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交往发达，再也没有许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简单社会可供研究了，原来初民部落的奇风异俗，有的也开发成了吸引远方来客的旅游项目。

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以数量形式表达研究的成果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的话，那么，现在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复归。这种趋势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转向。^②

功能理论与田野调查^③

功能学派（或称结构功能学派）和功能理论（或称结构功能理论）诞

① 参见雷亮中：《一个遥远村落的前世今生》，http://www.gmw.cn/content/2004-08/18/content_82081.htm。

② 参见刘瑁珺：《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科学》，<http://www.taosl.net/ljj04.htm>。

③ 本节主要参考张沁洁：《对功能理论基本概况的阐释》，<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shijiao/200210/200210210024.htm>。

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奠基人是波兰裔英国人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和英国人A.R.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二人于1922年分别出版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民》两部民族志专著,成为功能学派的奠基标志。目前,功能学派及其理论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仍有影响,并且是人类学的主流范式。

马林诺夫斯基在世仅58年,深受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著作的影响。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有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强调对研究调查对象的所言、所行与所思之差别的辨析;研讨班教学法;文化功能论;专著有《文化论》(1936)、《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原始的性爱》(1929)、《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自由与文明》(1944)、《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文化变迁的动力》(1945)、《巫术、科学与宗教》(1948)、《性、文化和神话》(1962)等等。

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的性爱》中声明:利用这次机会陈述田野调查工作的功能方法和对民族学材料进行综合性描述的重要意义;用公开认错的方式彻底改正过去的观点,再也不是进化论的正宗奉行着;认为“人类学功能学派”一词是他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己提出来的,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责任感;把文化的功能分析定义为“这种理论旨在通过人类学事实的功能,通过它们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部发挥的作用,通过它们在这个体系内互相联系的方式,通过这个体系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方式来对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人类学事实进行解释;旨在解释文化的特性,而不是对文化的进化过程或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猜测性的重构”;功能理论并不只是声称凡发挥功能的东西都一定具有某种功能。这将其观点和立场表现得更明确、肯定。

功能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中意指:在各文化事实相互关联的动态整体中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所体现的相对于文化整体而言的

各文化事实的价值、意义以及总体。但是任何文化功能都必须以某种文化事实及其相互间的客观的乃至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或称之为客观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文化功能的存在。不首先解决文化事实的客观社会结构以及功能如何与之对应的关系问题，文化功能的产生、比较、统一或连续就无从谈起。他撇开了文化事实的客观结构以及由结构到功能的顺序，只是把眼光圈定在功能上，并意欲通过巫术、宗教等文化功能比较来论证文化功能本身的差异统一、价值意义，进而说明这些文化事实的特质、本性。

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方法可以分为密切相关的两部分：实地调查考察法和材料整理分析法。他的实地考察工作方法有三个区别于前人的特点：第一，他反对把社会文化现象割裂为支离破碎、各自孤立的考察法，主张首先应该竭力把握人类文化生活的整体，在完整的文化体系背景中对各个文化事实及其相互关系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求最终把握住它们的本质。第二，主张参与式的局内观察法，即人类学家应该深入到土著居民中去，和他们融为一体，观察他们生活中包含的真实观念、情感，从而能够像土著居民一样体验、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主体自觉介入，即“以功能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水平’上的人类学事实”。

民族志与社区研究

所谓社区（community），一般地说，是指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内涵包括了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社区是一定的地理区域空间，人们在这个空间共同生活；第二，社区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它的形成基于人们共同生活中的社会互动；第三，社区是集体认同的一个标志，人们由于共同生活而对所在区域或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认同，视自己为社区的一分子。

罗伯特·帕克和搭档厄内斯特·伯杰斯等学者特别强调 community 的地域特征，两人曾在合著的《社会学导言》一书中提出：“社区一词系对

社会和社会集团的一种称述：当从地理分布上来考虑社会和社会集团所含的个人和体制时，我们就把社会或社会集团称为社区。”因此中国学者在翻译 community 一词时也沿袭帕克等人的观点，造出新词“社区”，以突出地域性特征。

社区作为地方性的社会，它所包含的各个系统和单位都分别担负着与当地社会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功能。一个完整的社区，其基本功能有：经济生活、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

中国较早的社区研究多在外籍教授指导下进行。例如 1918 年至 1919 年间，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步济时与美籍传教士甘布尔（S. D. Gamble）等主持的对北京的调查，并于 1921 年出版了《北京——一种社会调查》。这些社区研究多为综合性的记录式调查，较少理论分析。

中国学者自己的社区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乡村建设运动期间。比较著名的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开道和许仕廉主持的清河调查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和晏阳初的定县调查。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吴文藻（1901—1985）等中国社会学者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大力倡导在中国开展社区实地研究，认为研究社会应该从社区着眼，其功用有三：从实地考察中认识社会问题的实际状况；检验社会理论；及时地记录变动中的中国社会。

30 年代，费孝通（1910—2005）在抗战爆发前一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期间，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中国社区研究的名著《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 年在英国出版。这本书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刚刚兴起的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波动给这个乡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抗战期间，中国的社会学者在中国大西南继续社区研究。比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与商业》、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